



# 一本健康中国的好书

——读徐观潮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 □师力斌

我抱着浓厚的兴趣读完全书,想以极大的热情向读者朋友推荐徐观潮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它关于健康,关于我们;关于我们的身体,也关于我们的精神;关于我们的历史,也关于我们的未来。

首先要交代,我不是医学健康方面的专家,只是个文学编辑,在医疗专业方面不敢下任何判断,只能就其写作谈一点体会。这情形多少有点像影视评论中的路人甲,随便发点议论而已。对于这部作品,我正扮演了这样一个路人甲的角色。但由于多年来在编辑工作中编发了一些与医疗相关的报告文学,更由于多年来对中国医疗事业极为关注,所以,读这部书就仿佛有一种很熟悉的错觉,借此错觉把自己门外汉的身份顾虑关到门外,再说几句门外感:

一,这本书给我上了一堂生动、具体的中国百年健康史的课。作品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摆脱重大疾病威胁、构建健康中国大格局的追溯和正在进行的健康中国行动的真实记录,回顾了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健康之路,书写了新中国70年的健康史和生命史。像新中国禁毒禁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传染病、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康扶贫和中医突出重围等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描述。之前道听途说的一些历史知识,如禁毒禁娼这两件事关国人健康的老大难问题,还有毛主席诗句“华佗无奈小虫何”提到的血吸虫病,以及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详尽过程,在此书中找到了清楚的答案。与此类似,书中其他事件的叙述也都有头有尾,有点有面,有人物有情节。该书特别注重细节。有一个细节让我哑然失笑,叹服作者选材的功夫。说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新年的梦想”活动。鲁迅、林语堂、胡适等140多位名人说出了244个“梦想”。其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梦想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徐观潮用这个材料衬托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给力,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某一瞬间,我觉得拿这部书做爱国主义教材也无不可。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随时遭受疾病瘟疫的威胁,国民健康降到了最低谷。经过70年奋斗,人均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婴幼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医疗机构数量从0.9万个增加到99.7万个,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等,一组组数据见证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中国涅槃重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和健康的奇迹,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东方巨人”的转变。在书尾,作者将最新发生的抗击新冠疫情纳入其中,为70年的健康医疗史添上浓重的一笔。

正如历史并非一片光明,作者也并未一味赞颂。书中对1980年代以来全民关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做了详尽梳理和深入反思。比如,原来的赤脚医生制度以及基层合作医疗体系,以极低的投入取得较高健康医疗效果,对当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全国人民一窝蜂涌到大城市看病的困状,是否具有启示性?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忽略乡村和基层,是否值得反思?基层乡村和社区在全民医疗健康中的重要地位,在此次全民抗疫中再一次突显,再次让人思考原有医疗制度中的合理因素。

二,这本书给我普及了许多健康知识,传授了不少健康观念,加深了我对健康医疗的理解。比如面瘫,如果医治及时,找到医生,两三千块钱就能搞定,弄不对,花好几万都治不好。这是省钱的健康知识。还有救命知识,如急救“120”识别法,这里不赘述,详情大家去看书。还有医疗观念,比如“从治已病到治未病”,健康防线前移,防患于未然,这个观念既古老又前卫,不能不服作者的眼光和手段。再比如“精神卫生”概念对我的冲击。以前我对疾病的理解很单纯,要么生病,要么健康。后来深入了一点,知道了亚健康。这后看到“精神卫生”的概念及其叙述,对健康的理解深入了许多。总之,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肉体到精神,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能经历的许多沟沟坎坎,本书多有涉及,信息量丰富,读来颇有启悟。当然,这些知识、观念的推送不像微信里流传的治病小窍门那样直截了当,而是被巧妙夹带在一个个医疗故事中间。实际上,作者徐观潮是卫生健康战线的工作者,并非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他长期工作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保证了本书在专业方面的质量和水准。

三,这本书的文学修养和叙事能力值得一提。作者一向善于驾驭大题材、写大历史,有大气势,旁征博引,知识广博,这在他先前的《名将陶侃》等著作中就有体现。阅读本书,又一次体会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功力。本书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动作、内心世界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现,许多感人至深的段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再展开。在叙事结构上,既能站在全局把握总体架构,又能置身局部呈现具体问题,总分相承,变幻自如,点和面的恰当结合,避免了材料大杂烩的弊端。作品的可读性、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其实也根于其文学修养和叙事功力,只不过作者不属于那种铺张奢华的写作风格,而采取了一种内敛朴素的路数。感觉这部书既可以作为普及性的医疗史读物,也可以作为专业性的思想参考。

四,这本书的情感立场让我点赞。此书是给人物立传,为情造文,以情动人,闪耀人道主义的光彩。身为基层卫生战线的工作者,徐观潮对患者、医生、家属,对一切采访对象,都浸润了丰沛的情感。据他所言,为写作该书,他100多天跑遍了江西6个地

市、32个县(区、市)、60多个乡镇和50多个单位,采访了200余位卫生健康领域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身上的光点和痛苦,成为徐观潮的写作动力。“花桥有三多。一是病患多。肝病、肾病,心脏病,脊髓炎,高血压,肺癌,小儿麻疹,脑瘫,看一眼都让人心生悲苦。二是伤残多。肢残,身残,面残,脑残,应有尽有。仅他居住的湖下嘴,以拐杖代步的就不下十人。数遍花桥,有六十三根拐杖。道官垅一家七口竟能拿出五个残疾证,谁看到谁揪心。三是智障多。”“谁看到谁揪心”无疑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而他为那些艰辛的医务工作者、孤寂的事业开拓者、痛苦而坚韧的病患者写下的文字,可谓字字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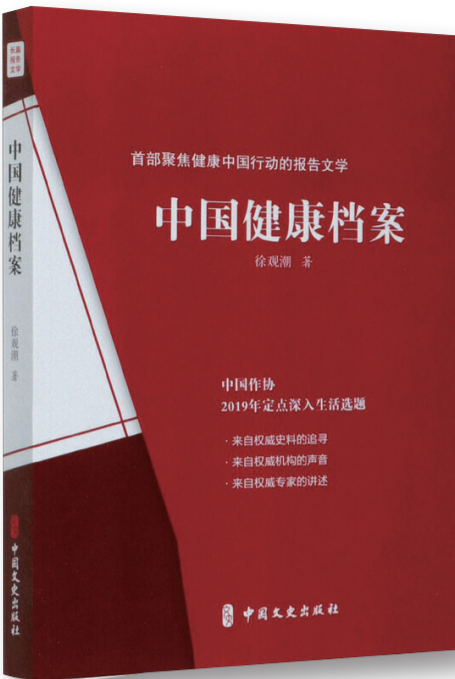
徐观潮对国家和乡土持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他在文中说,“我追随共和国的脚步时,心里在战栗,也在深深震撼!感觉有一丝丝的温暖从全身的毛孔蜂拥而入。这是一种兴奋的感觉,一种自豪的感觉,一种希望的感觉。”毫无疑问,中国医疗、中国健康是此次写作的主题。同时,他作为江西人,对江西的医疗事业情有独钟。江西医疗、江西健康是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也是观察中国医疗健康的立足点。70年来,江西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53年的32.25岁提高到76岁,孕产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96.3/10万下降到2018年的8.41/10万,婴幼儿死亡率由1990年的55%下降到5.5%,医疗机构从141个增加到3.65万个。看得出来,他对江西这些发展成就有所“偏心”。

文以明道。《中国健康档案》讲述的既是健康之道,还是生命之道。它为中国健康打开了一扇窗,一个昂首前行的中国尽在眼中,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也尽在眼中。这独特的风景,提醒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

支撑问题,作者提出了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吸引外出青年回流、让告老能还乡等解决方法,应该说颇有见地。当然,农村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户籍制度的松绑等,已经超出了狭义乡村治理的范围,需要在推进城镇化和整个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寻求解决之道。可喜的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开始。

通过描述一个村寨的变化来解析中国农村的变迁,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但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好的事情。《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为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并较好地实现了作者的初衷。本书所选取的水头寨,作为中西部的一个平凡山村,固然不似大寨、小岗村、华西村那样声名显赫,然而正因为其默默无闻和平凡农村,却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中国的广袤农村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平凡村寨组成的。作为从水头寨走出来的青年,本书作者对家乡有着天然的体察和深挚的情感,对民族地区发展和三农问题有着持久的关注和思考,多年新闻媒体的从业经历又赋予作者比较广博的见闻。这些因素使《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既具有敏感与纪实的新闻风格,又具有理性与思辨的社会学色彩,从而将自然状态下的水头寨变成了读者眼中一个可感可析、流动透明的“人文”水头寨,成为解析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样本。

中国的农村广袤复杂、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固然不是通过对一个村寨的描述和解析所能涵盖的,但《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还是比较出色地提供了这种变迁的一朵浪花,一个侧面,因而值得所有关心、关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人们一读。作者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更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是中国的另一半,随着乡村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传统文化式微,处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如何治理更有效?城乡一体化如何更加相得益彰?人们的生活如何过得更幸福?



首部聚焦健康中国行动的报告文学  
中国健康档案  
徐观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作协  
2019年定点深入生活选题  
来自权威史料的指导  
来自权威机构的声誉  
来自权威专家的讲述

司马迁及其《史记》一直是出版热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个热点愈演愈烈,似乎有种“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趋势。这些图书中既有通俗读物,亦有学术研究著作,如韩兆琦的《点赞·质疑:史记研读随笔》、杨照的《史记的读法》、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之《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张新科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等,普遍不断再版,入选各种好书榜评选。此外,青年历史作家刘勃也推出了其作为“历史三部曲”之一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颇得好评,亦引发了相关评论。综观这些评论,一律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归为历史读物。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没有错,但不全面,忽略了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这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的传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片面评价,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没有仔细阅读作者在“后记”中的声明:“写这本小书是一个意外。2019年11月份,《国家人文历史》的纪鹏老师约我为司马迁写一篇小传,六千字。一不留神就伸到一万。”

二、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忽略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所讲述汉武帝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上,所以将之简单归为历史读物。

三、关于传记文体特征以及传记与历史读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以上片面认识的学术方面因素。无论是从作者的声明,还是从整个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都可以说,这部著作首先是一部传记,较完整地讲述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只认为是司马迁的传记,这部书中还讲述了那么多汉武帝时期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多事件和人物并没有与司马迁本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这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这本书的叙事策略来分析。

## 别具一格的叙事

这部传记的叙事别具特色,有别于大多数传记叙事,在结构布置上设置了两条叙事主线:一是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线,一是汉武帝时代叙事线,以司马迁生平为纵向叙事,以汉武帝时代为横向叙事,由纵到横,由司马迁的生平引申出汉武帝时代中的事件和人物,由点到面,深度讲述,纵横交叉,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包括社会、经济、军事以及后宫斗争等等在内的整个汉武帝时期历史画卷。比如,第二章“一统”中,开头时讲司马迁20岁开始的壮游,他要搜集天下散佚的史书,了解各地的风俗旧闻,这时候叙述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但到了“到长安去”这一小节的时候,作者巧妙地将叙事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变为隐形视角——用传主司马迁的视角来呈现汉武帝时期作为一个繁荣时代的都市长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吸引力:司马相如、庄助、朱买臣等人纷纷离开使自己仕途陷入低谷的原籍,长途跋涉到长安寻求机遇,果然都在这个新兴都市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作者是想通过司马迁壮游过程中所见当时豪杰英俊纷纷在骚动不安、跃跃欲试的现状,将叙事切入到汉武帝时期人才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更想以此来反映一个盛世的出现是需要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传记是成功的,在传记叙事策略上做出了创新性尝试。当然,如果不太熟悉作者在叙事上的别具匠心,读者容易忽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会认为这只是一部讲述汉武帝及其时代的历史读物。

传记中运用叙事视角的转换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鹗、林纾、吴趼人等“新小说”家在西方小说叙事影响下尝试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全知视角、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以及纯客观叙事之间相互转换的实践。比如,在一篇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突然加入中国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铺叙事件的背景等超越叙述者视角的内容。这样的随意转换叙事视角,当然带来破坏叙事整体性和文学性的弊端,但从当时的传统审美角度看,这样的叙事能够补充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小说完成“为一种社会之历史”、“可备史家之采摭”、“可补正史之阙”这个重要的任务。“新小说”家在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丰富性影响后,尝试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进行改变,不过因为受传统审美习惯的牵制,又缺乏西方小说理论系统的指导,“新小说”的叙事视角转换尚处于模仿借鉴阶段,甚至可以说只是模仿了西方小说的形式却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但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作者刘勃非常熟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手法,可以说在这部传记中运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文亦史的创作手法。中国是历史大国,而且最早的历史书写是文史不分,这也是《史记》之所以呈现出文学性和真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讨论焦点所在,钱锺书甚至在《管锥编》中专门分析在赵盾弑君事件里对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当鉏麇看到赵盾家里大门敞开着,家具摆设非常节俭,与其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要身份不相符合,惭愧至极,自言自语:“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然后触槐而死。钱锺书认为,作者怎么知道如此私密的心理活动,是谁在鉏麇身边听到了吗?显然这就是文学虚构。

关于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也曾论述过:“……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麇之臂,久已反翮,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然诗情悲侧,人人传诵,固未察其无是事理也。想鉏麇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随笔妆点”即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法虚构合情合理的细节。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历史读物,都应该以真实为本,但也对传主司马迁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如,终章“绝笔”中分析《报任安书》的写作及其背后原因时,对司马迁为什么写这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书”的内心想法做了如下描述:“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走进司马迁内心,为其给任安回信安排了“合理的动机”。这样的虚构符合传记叙事手法中的“合理想象”,这正如《韩非子》中所言“人希见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合理的想象就是按照死象的骨架来为其添加血肉,使之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写司马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运用了司马迁最擅长的亦文亦史手法,以司马迁的方式回忆司马迁,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史记》栩栩如生写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 问题与商榷

除了以上两点创新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一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认为是“巫蛊之祸”之前,此时任安还没有在监狱遭遇图穷之灾,不然2000多字的竹简如何送到监狱里去。从这些分析看,作者的判断似乎可以成立,但从这封信的写作目的看,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司马迁是想通过这封信来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我们今天所看到《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次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司马迁的这封信并不是普通的给朋友的书信,他的目的并不是送到任安手上,或者说,送到朋友手上并不是这封信的惟一目的,而是借用书信这样的载体和形式向世人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曾与笔者谈到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宣言书,其目的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相似。所以,任安在不在监狱,信能不能送到任安手中,并不是判断这封信写作时间的惟一有效根据。

二是,纵览全书,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几乎都提到了,不过有一点没有交代,即司马迁在汉代西南夷平定事件中的作用。司马迁曾在前111年奉汉武帝之命,担任朗中将军的职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传达中央的军令,并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在西南待了12个月,这也是其在政治生涯中扮演有别于史官身份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作者忽略了这个事件,比较遗憾,应该在序章“盛世”开头部分父子临终之别时插叙最好。由此也导致了该书中的一个知识性错误,作者说:汉武帝“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第四章“开拓”)作者说司马迁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具体工作,而此次出使西南、设郡置吏,对当时的汉代而言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开疆拓土,扩大国家影响,与北伐匈奴处于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司马迁一生担任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角色。

三是第十章“倾国”,关于李夫人的身份建构以及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引用的都是《汉书》《汉武故事》和《资治通鉴》,因为《史记》里没有提到这些,似乎超出了本书以司马迁为叙事主线讲述汉武帝时代的结构设置,而且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似乎不太符合全书的设置。这样的布置类似“新小说”时期,所叙述事件常常超越所设置人物视角的写作,其实完全可以第十章“倾国”作为“附录”来交代。不过,“倾国”这章写得非常成功,对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词入手推论出李夫人以及李氏外戚集团才是“倾国”的罪魁祸首这个结论,非常符合历史研究中演绎推理方法。

总的来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作品,通过司马迁的生平观照整个汉武帝时期,时代、经济、军事、民生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尤其是运用史料文献比较学、归纳法,对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合理的分析和推测,从而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运用恰当的比较手法,提高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在叙事结构设置上的独创性,司马迁对生逢盛世的豪情以及命运转折时的悲愤,与汉武帝盛世繁荣时期的志得意满以及连年征伐过程中的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独断专横、孤寂晚年形成对比,一主一副、一点一面,双线叙事呈现相对一致的情感发展趋势,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此外,该书的语言生动鲜活,有时采用网络化的语言,这虽然对正统历史读物和传记而言是弊病,但作为通俗读物来讲,增加了其生动性,更易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

司马迁及其《史记》一直是出版热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个热点愈演愈烈,似乎有种“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趋势。这些图书中既有通俗读物,亦有学术研究著作,如韩兆琦的《点赞·质疑:史记研读随笔》、杨照的《史记的读法》、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之《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张新科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等,普遍不断再版,入选各种好书榜评选。此外,青年历史作家刘勃也推出了其作为“历史三部曲”之一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颇得好评,亦引发了相关评论。综观这些评论,一律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归为历史读物。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没有错,但不全面,忽略了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这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的传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片面评价,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没有仔细阅读作者在“后记”中的声明:“写这本小书是一个意外。2019年11月份,《国家人文历史》的纪鹏老师约我为司马迁写一篇小传,六千字。一不留神就伸到一万。”

二、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忽略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所讲述汉武帝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上,所以将之简单归为历史读物。

三、关于传记文体特征以及传记与历史读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以上片面认识的学术方面因素。无论是从作者的声明,还是从整个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都可以说,这部著作首先是一部传记,较完整地讲述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只认为是司马迁的传记,这部书中还讲述了那么多汉武帝时期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多事件和人物并没有与司马迁本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这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这本书的叙事策略来分析。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作者刘勃非常熟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手法,可以说在这部传记中运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文亦史的创作手法。中国是历史大国,而且最早的历史书写是文史不分,这也是《史记》之所以呈现出文学性和真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讨论焦点所在,钱锺书甚至在《管锥编》中专门分析在赵盾弑君事件里对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当鉏麇看到赵盾家里大门敞开着,家具摆设非常节俭,与其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要身份不相符合,惭愧至极,自言自语:“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然后触槐而死。钱锺书认为,作者怎么知道如此私密的心理活动,是谁在鉏麇身边听到了吗?显然这就是文学虚构。

关于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也曾论述过:“……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麇之臂,久已反翮,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然诗情悲侧,人人传诵,固未察其无是事理也。想鉏麇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随笔妆点”即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法虚构合情合理的细节。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历史读物,都应该以真实为本,但也对传主司马迁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如,终章“绝笔”中分析《报任安书》的写作及其背后原因时,对司马迁为什么写这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书”的内心想法做了如下描述:“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走进司马迁内心,为其给任安回信安排了“合理的动机”。这样的虚构符合传记叙事手法中的“合理想象”,这正如《韩非子》中所言“人希见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合理的想象就是按照死象的骨架来为其添加血肉,使之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写司马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运用了司马迁最擅长的亦文亦史手法,以司马迁的方式回忆司马迁,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史记》栩栩如生写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除了以上两点创新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一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认为是“巫蛊之祸”之前,此时任安还没有在监狱遭遇图穷之灾,不然2000多字的竹简如何送到监狱里去。从这些分析看,作者的判断似乎可以成立,但从这封信的写作目的看,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司马迁是想通过这封信来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我们今天所看到《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次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司马迁的这封信并不是普通的给朋友的书信,他的目的并不是送到任安手上,或者说,送到朋友手上并不是这封信的惟一目的,而是借用书信这样的载体和形式向世人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曾与笔者谈到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宣言书,其目的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相似。所以,任安在不在监狱,信能不能送到任安手中,并不是判断这封信写作时间的惟一有效根据。

二是,纵览全书,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几乎都提到了,不过有一点没有交代,即司马迁在汉代西南夷平定事件中的作用。司马迁曾在前111年奉汉武帝之命,担任朗中将军的职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传达中央的军令,并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在西南待了12个月,这也是其在政治生涯中扮演有别于史官身份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作者忽略了这个事件,比较遗憾,应该在序章“盛世”开头部分父子临终之别时插叙最好。由此也导致了该书中的一个知识性错误,作者说:汉武帝“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第四章“开拓”)作者说司马迁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具体工作,而此次出使西南、设郡置吏,对当时的汉代而言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开疆拓土,扩大国家影响,与北伐匈奴处于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司马迁一生担任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角色。

三是第十章“倾国”,关于李夫人的身份建构以及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引用的都是《汉书》《汉武故事》和《资治通鉴》,因为《史记》里没有提到这些,似乎超出了本书以司马迁为叙事主线讲述汉武帝时代的结构设置,而且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似乎不太符合全书的设置。这样的布置类似“新小说”时期,所叙述事件常常超越所设置人物视角的写作,其实完全可以第十章“倾国”作为“附录”来交代。不过,“倾国”这章写得非常成功,对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词入手推论出李夫人以及李氏外戚集团才是“倾国”的罪魁祸首这个结论,非常符合历史研究中演绎推理方法。

总的来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作品,通过司马迁的生平观照整个汉武帝时期,时代、经济、军事、民生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尤其是运用史料文献比较学、归纳法,对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合理的分析和推测,从而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运用恰当的比较手法,提高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在叙事结构设置上的独创性,司马迁对生逢盛世的豪情以及命运转折时的悲愤,与汉武帝盛世繁荣时期的志得意满以及连年征伐过程中的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独断专横、孤寂晚年形成对比,一主一副、一点一面,双线叙事呈现相对一致的情感发展趋势,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此外,该书的语言生动鲜活,有时采用网络化的语言,这虽然对正统历史读物和传记而言是弊病,但作为通俗读物来讲,增加了其生动性,更易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

司马迁及其《史记》一直是出版热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个热点愈演愈烈,似乎有种“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趋势。这些图书中既有通俗读物,亦有学术研究著作,如韩兆琦的《点赞·质疑:史记研读随笔》、杨照的《史记的读法》、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之《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张新科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等,普遍不断再版,入选各种好书榜评选。此外,青年历史作家刘勃也推出了其作为“历史三部曲”之一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颇得好评,亦引发了相关评论。综观这些评论,一律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归为历史读物。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没有错,但不全面,忽略了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这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的传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片面评价,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没有仔细阅读作者在“后记”中的声明:“写这本小书是一个意外。2019年11月份,《国家人文历史》的纪鹏老师约我为司马迁写一篇小传,六千字。一不留神就伸到一万。”

二、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忽略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所讲述汉武帝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上,所以将之简单归为历史读物。

三、关于传记文体特征以及传记与历史读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以上片面认识的学术方面因素。无论是从作者的声明,还是从整个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都可以说,这部著作首先是一部传记,较完整地讲述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只认为是司马迁的传记,这部书中还讲述了那么多汉武帝时期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多事件和人物并没有与司马迁本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这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这本书的叙事策略来分析。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作者刘勃非常熟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手法,可以说在这部传记中运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文亦史的创作手法。中国是历史大国,而且最早的历史书写是文史不分,这也是《史记》之所以呈现出文学性和真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讨论焦点所在,钱锺书甚至在《管锥编》中专门分析在赵盾弑君事件里对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当鉏麇看到赵盾家里大门敞开着,家具摆设非常节俭,与其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要身份不相符合,惭愧至极,自言自语:“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然后触槐而死。钱锺书认为,作者怎么知道如此私密的心理活动,是谁在鉏麇身边听到了吗?显然这就是文学虚构。

关于鉏麇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也曾论述过:“……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麇之臂,久已反翮,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然诗情悲侧,人人传诵,固未察其无是事理也。想鉏麇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随笔妆点”即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法虚构合情合理的细节。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历史读物,都应该以真实为本,但也对传主司马迁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如,终章“绝笔”中分析《报任安书》的写作及其背后原因时,对司马迁为什么写这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书”的内心想法做了如下描述:“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走进司马迁内心,为其给任安回信安排了“合理的动机”。这样的虚构符合传记叙事手法中的“合理想象”,这正如《韩非子》中所言“人希见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合理的想象就是按照死象的骨架来为其添加血肉,使之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写司马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运用了司马迁最擅长的亦文亦史手法,以司马迁的方式回忆司马迁,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史记》栩栩如生写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除了以上两点创新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一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认为是“巫蛊之祸”之前,此时任安还没有在监狱遭遇图穷之灾,不然2000多字的竹简如何送到监狱里去。从这些分析看,作者的判断似乎可以成立,但从这封信的写作目的看,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司马迁是想通过这封信来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我们今天所看到《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次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司马迁的这封信并不是普通的给朋友的书信,他的目的并不是送到任安手上,或者说,送到朋友手上并不是这封信的惟一目的,而是借用书信这样的载体和形式向世人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曾与笔者谈到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宣言书,其目的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相似。所以,任安在不在监狱,信能不能送到任安手中,并不是判断这封信写作时间的惟一有效根据。

二是,纵览全书,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几乎都提到了,不过有一点没有交代,即司马迁在汉代西南夷平定事件中的作用。司马迁曾在前111年奉汉武帝之命,担任朗中将军的职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传达中央的军令,并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在西南待了12个月,这也是其在政治生涯中扮演有别于史官身份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作者忽略了这个事件,比较遗憾,应该在序章“盛世”开头部分父子临终之别时插叙最好。由此也导致了该书中的一个知识性错误,作者说:汉武帝“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第四章“开拓”)作者说司马迁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具体工作,而此次出使西南、设郡置吏,对当时的汉代而言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开疆拓土,扩大国家影响,与北伐匈奴处于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司马迁一生担任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角色。

三是第十章“倾国”,关于李夫人的身份建构以及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引用的都是《汉书》《汉武故事》和《资治通鉴》,因为《史记》里没有提到这些,似乎超出了本书以司马迁为叙事主线讲述汉武帝时代的结构设置,而且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似乎不太符合全书的设置。这样的布置类似“新小说”时期,所叙述事件常常超越所设置人物视角的写作,其实完全可以第十章“倾国”作为“附录”来交代。不过,“倾国”这章写得非常成功,对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词入手推论出李夫人以及李氏外戚集团才是“倾国”的罪魁祸首这个结论,非常符合历史研究中演绎推理方法。

当代中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它的变迁。而变迁发生最早、最深刻的,是在中国的农村。因此,欲了解变迁中的当代中国,必先了解变迁中的中国农村。李寅著《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通过对贵州省纳雍县水头寨的生动描述和多维观察,为人们了解变迁中的中国农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读本。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土地是农村的根基,二者的相依相构构成中国农村的基本关系。这一基本关系的演变是当代农村变迁的主线。《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以水头寨为切入点,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新中国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对土地从依恋、困守到如今半离土状态的变迁。这种变迁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所呈现的复杂样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既有传统农民对土地的坚守与困顿,也有农民工对土地的弃守与羁绊,更有由此产生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无奈的苦与期盼。这些留乡、心态各异的群像构成了当代农村色彩多样的风景。它提示人们,尽管土地制度发生着深刻变革,但变革的使命还远未完成;尽管广大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要过上富足、安然的美好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似乎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密不可分,但仍如作者所说,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解答好这一命题是乡村振兴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

如果说土地曾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传统乡土文化则是农民赖以生活的精神家园。几乎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同步,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乡土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受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和剥蚀。这是《水头

## 看见另一半中国

——读李寅《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

魏新生

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带给人们的另一种深刻画面。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的水头寨是乡土文化的富集区,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相得益彰,滋润着村民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但伴随近几十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无论是传统清明挂纸、乡村红白喜事,还是共荣共存的民族文化,都在发生着润物无声的变化。在作者所描述的这种变化图景中,读者不仅看到了来自现代化风潮的剥蚀,也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和人们对她的坚守,尤其是“父慈子孝、长幼有序、诚实善良这些乡村优良传统作为村庄精神依然顽强而坚韧”。可以预期,这种剥蚀与坚守的博弈仍将持续,而对自身优秀因子的传承、对现代风尚的吸收,将使传统乡村文化逐步走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继续承担起新农村精神家园的使命。

土地与农民关系的演变,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乡村,在当代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其中既含有传统乡村自治的因素,也包含基层政权的介入管理。面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其带来的新的格局,过去行之有效的民间传统方法日渐式微,基层政权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从而对当下的乡村治理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和思考。作者一方面提出了诸如“互惠互助还能延续吗”,怎样缓解“打工之痛”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一位老县长的回忆”“解码糖约经验”等提供了若干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和做法,并对一些时代性的课题提供了专家建议和自己的思考。譬如,针对乡村振兴的人才